

美国汉学家赫伯特·芬格莱特：展示『即凡而圣』的孔子

□ 冯晨

日常生活所离不开的礼上。在众多研究者的眼中，礼的规范性呈现一种理性。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理解礼并依照它而行动，就可以实现个体道德并能够确立完善的人格。但是，芬格莱特对孔子的认识并没有止于此，他把礼作为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即“人是一种礼仪的存在（a ceremonial being）”。他以《论语·为政》篇“道之以政，齐之以刑”为例，说明“礼”的形式所反映的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而其背后则是内在的道德之心。统治者只有用礼把人们引导到这一道德领域，让人潜移默化地形成道德之心，从而以违反道德规则为耻。基于这种认识，芬格莱特认为礼虽然具有公共性，但是，理解并实行礼则是个人的感悟。于是，他把孔子比喻为一位卓越的音乐演奏者。此演奏者有一种能力，能够把固定的乐谱转化为华丽的乐章。由此，他认为孔子是一个专注的“乐迷”，具有对“音乐”的敏感和个人的智慧，能够根据自己的理解基于枯燥的乐谱弹奏出生动的音乐。芬格莱特说的乐谱，就是孔子所处社会的礼。

基于这个比喻，芬格莱特认为每个人都会根据自己对礼的理解而履行自己的责任，形成自己的行为。并且，芬格莱特根据这一比喻，发现了孔子“仁”的秘密：“他根据与他一道在礼仪活动的其他人的参与来将所有那些人视为和他自己一样具有终极平等的尊严，那么，这一行为就可以被视为是仁。”由此出发，芬格莱特认为“仁者能够通过礼使其力量辐射到天下的每个角落。这种力量必须从行为者散发出来”。显然，相对仁来说，芬格莱特给予礼以更基础的位置，这一点不同于很多学者。就此，芬格莱特发现，孔子思想中人的价值、尊严及其神圣性并非源自“天”或“理性”，而是源自“礼”。个体生命以感悟和“演奏”获得“礼”所具有的力量，创造性地实现自己的价值，获得人的品格。

概念转换:新理想的创造者

以对礼的理解为基础，芬格莱特跳出惯有的看待中国哲学的思维模式，没有把孔子有关人的理解仅仅作为人的形而上学本质，而是把人放在礼的关系中，使之成为人际之间的一种意义。在芬格莱特看来，礼成为与生活密切关联的公共交往系统，礼通过个体之间的交往而成为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之前因祭祀而具有神圣性的礼，通过孔子的理解而内化在人际之间，成为人的神圣性的表达。如芬格莱特说：“在礼的概念的转换中，孔子也转换了人类社会的整个概念。他是一种新理想的创造者，而不是旧观念的解辩人。”就此理解，在孔子的世界中，人际关系的形式就此变为共同学习礼并自愿参与礼的活动，人通过有关礼的活动而获得自己的尊严和价值。整个人类社群通过礼所获得的神圣性其实就源于人们遵循礼的日常生活中。

就此，芬格莱特给出，“孔子认为人之所以不神圣，是因为他的绝对的自我中心、孤立于他人，也孤立于神圣和不朽灵魂的一面，孔子思想的中心主题也不是个体的充分发展，而是人性在人类礼仪行为中的充分展开”。而礼仪的展开是具体的生活，个体行为的准则也是礼，这就是所谓“礼以行之”。同时，在孔子的世界中，礼与个体的内心世界也是紧密联系着的，孔子云：“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由此可见，芬格莱特把孔子思想放在以神圣礼仪为维度的世界中，从生活世界中看到了其思想所蕴含的人的神圣性。

芬格莱特对孔子的解读方式启示我们，任何时代的人们只有在传统的熏陶下才能真正成长起来并成为具有价值的人。传统的精神虽然呈现为凡俗的生活，但其中蕴含着人的神圣性。具有至高价值的人是与道相合的生命——仁的生命，而不是个体存在本身。

生动比喻:作为音乐演奏者的孔子

芬格莱特研究孔子不在概念上一味“转悠”，而是把眼光放在了

历史上齐国临淄为什么火？

□ 李春蕾

其礼，丧三年然后除之，故迟。”周公闻言，不禁忧叹鲁国恐怕要被齐国打败。后来历史证明，果真如此。

为何齐国会成为大国呢？周公道出了齐国人的成功密码：“夫政不简不易，民不有近；平易近民，民必归之。”社会治理的好，关键就在于政府要“平易近民”。平易近民这四个字看似简单，实则意蕴非常广阔。既表明政令的制定要因地制宜、不墨守成规，又表明政令的施行要简便易行、不人为设限给百姓制造困难。同时又带有不脱离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同百姓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的民本色彩。3000年前的齐国就靠着平易近民的施政原则，柔远能迩，一步步成为东方土地上的大国。

虚车勿索 以来远人

淄博作为齐文化的发源地，历来具有重视工商业、重视招商引资的“基因”。2700多年前，一位政治家、思想家、经济学家在淄博这片土地上主导了一次大的经济变法，使齐国一跃成为春秋时期的霸主。这个人就是齐国丞相管仲。

管仲是一个善于优化营商环境的能手。齐国土地贫瘠，粮产不丰，但却盛产食盐、木器、丝绸。想要获得粮食，无疑需要商人来进行出口贸易。为了吸引商人来齐国经商，管仲先是提出降低税收等一系列措施。“征于关者，勿征于市，征于市者，勿征于关”，即入关的关卡和集市只征一处税，不重复征税；“虚车勿索，徒负勿入”，对没有载货的空车和背着货物的小商贩免税。与此同时，管仲还下令为远道而来的商人提供专门的住宿。

“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刍菹，五乘者有伍养”，如果是一辆车，那么在住宿的基础上提供餐饮；三辆车则提供牛马所需的草料；五辆车则提供专门的服务人员。一系列的措施下，“天下之商贾归齐若流水”，极大地提高了齐国的经济水平。

为了营造良好的市场氛围，管仲同时对商人作出道德上的规范，提出“非诚贾不得食于贾”。意思是如果商人不诚信就不配做一个商人。商人的“诚”，一方面是要在开展商业活动时遵循诚实守信的原则。另一方面是要以诚待人，以诚对待顾客。内心真诚，对待顾客才会有温情，买卖才能做长远。

事实上，2000多年前齐国商业的大发展，正是齐国与商人“双向奔赴”的结果。正因为齐国推诚心，大力优化营商环境，所以商人们才会不远万里，诚信经营，带来齐国所需的粮食，并将齐国的特产远销他国。商人对齐国经济发展的贡献，某种程度来说，不完全是冰冷的交易，亦是对齐国温情的回报。

尊重人才 纳士招贤

淄博这片土地自古以来就有尊重人才、重视纳士招贤的传统。2300多年前，齐威王创办稷下学宫。这所高等学府容纳了儒家、法家、道家、墨家、阴阳家、纵横家等各派学者。他们在这里既开展学术研究，又为齐国发展提供咨政议政的服务。诸子百家的各种思想交错碰撞，既彼此博弈，又相互交融，从而使稷下学宫成为战国时代百家争鸣的中心。

《风俗通义》记载：“齐威、宣王

坚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爱国实业家胡厥文

□ 李萍 李飞



胡厥文是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政治活动家、杰出实业家。他早年创办新民机器厂、合作五金公司、黄渡电灯公司、长城机制砖瓦公司等企业，为发展民族工业作出重要贡献。他和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结下深厚友谊，竭尽全力支持党的革命事业，团结动员民族工商业和知识界人士投入爱国民主运动，为建立和平、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是我国民族工商业的一位杰出代表，被称为爱国实业家的典范。

立志实业救国

胡厥文，又名胡保祥，1895年10月出生于上海嘉定。他自幼天资聪颖，勤奋好学。胡厥文的青少年时期，正是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年代，中华民族忍受屈辱的现实，强烈地震撼了他，亡国灭种的威胁“时萦脑海，无时或释”。胡厥文认为要拯救国弱民贫的中国，只有振兴实业。没有轮船、火车、飞机、大炮，何以抵御外敌？他怀着“实业救国”的强烈愿望，如愿考取北京高等工业专门学校，专攻机械制造专业，毕业后即到工厂从一名普通钳工干起，以顽强的毅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收集掌握基础资料，积累了生产操作经验。

1921年，胡厥文创办了新民机器厂，矢志发展我国的母机工业。他坚信外国人能干的，中国人也能干。大胆改革工序，吸收先进技术，不断推出新产品。生产出的产品以质量上乘、价格低廉而广受欢迎。短短几年，他经营的企业从一个发展到五个，胡厥文也因此而成为远近闻名的实业界人物。

1932年1月，日本侵略军进犯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抵抗。胡厥文意识到仅仅依靠实业，无法从根本上救中

国。时值壮年的胡厥文奋臂向前，全力投入抗日救亡中，组织工人们日夜赶制手榴弹、炮弹支援前线作战。当他得知兵工厂生产迫击炮弹缺少人手，立即安排40多名熟练的翻砂工人前去支援。得知十九路军武器装备差，弹药供应十分困难，他立即动员上海其他企业抽调工人，拆迁工厂机器，到沪南建临时工场，赶制手榴弹、炮弹、地雷、水雷送往前线，支援守军对日作战。他还发动机器同业会员家属们前去慰问救护伤员，赶制棉衣，鼓励大家团结起来，抗日救国，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

保存实力内迁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上海的形势日趋紧张。为保存民族工业实力，胡厥文向南京国民政府请愿，催促国民党政府加快实施工厂内迁。他发动江浙沪宁的百余家属营工厂内迁，同年8月，他率先行动，带领自己经营的几家工厂职员、家属连同机器设备和物资，乘21艘木船，冒着敌人的炮火，踏上了内迁的征途。途中历尽千难万险，保存了可贵的人力物力资源，成为抗战时期后方民族工业的中坚力量，在军需民用生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9年1月，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到胡厥文所办的合作五金厂参观，他们观看了工人的操作技术，高度评价工人们团结合作、支援抗战的精神。周恩来欣然为工厂题词：“供给前方的生产，是国防工业第一要义”。

由于连年战乱，生产民族工业所需的原材料来源日趋紧张。国民党政府对内迁的工矿企业从原料到生产、流通市场等环节都严加控制，造成原料短缺、市场紧缩、捐税增加，而国民党四大家族运用手中的权力，操纵财政金融，大发国难财，乘民族工业之危进行掠夺和吞并。内迁工厂数量急剧萎缩，多数工厂难以维继而倒闭。工人大量失业，生活没有着落，胡厥文痛心不已。他带领工人代表们前往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请愿，却遭到

无情拒绝，工厂艰难的境况和遭遇，使他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深恶痛绝，却又无可奈何。

投身民主革命

1945年8月，中共领导人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达成《双十协定》，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及战后建国的主张，给胡厥文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得到国内外舆论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广大人民群众迫切呼吁和平，国民党当局陷入被动局面。中国共产党一心为民的主张，正好符合胡厥文内心的强烈愿望。他意识到没有民主开明的政治，就无法实现救国的理想。在共产党人的影响下，胡厥文逐步从“实业救国”的幻想中走出来，毅然投身到共产党领导的民主革命洪流之中。

抗战胜利后，重庆各派政治力量空前活跃。胡厥文积极响应中共中央提出召开党派会议协商和组织联合政府的号召，联合业界要求实现和平、民主，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变经济政策，维护民族工商业的利益。他勇敢地发表政见，为中国实现工业化抗争，争取民主与和平，从此走上了一生的转折点。他和黄炎培等人发起组建中国民主建国会，团结爱国工商企业家和知识分子，为建立和平、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斗争。

胡厥文在上海带领民建成员积极开展工作，为迎接上海解放作准备。1949年6月15日，胡厥文在北平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9月，他作为正式代表以无比激动的心情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选举产生新中国中央人民政府领导班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作出了积极贡献。

坚定跟随共产党

新中国成立后，胡厥文满怀热情投入祖国建设。他经常组织工商界人士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鼓励

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宠之。若邹衍、田骈、淳于髡之属甚众，号曰列大夫，皆世所称，咸作书刺世。”为招纳贤才，齐国不仅在生活上为稷下学者提供优渥的物质条件，给予优秀人才“上大夫之禄”，允许他们享受大夫的待遇和奉养。同时在政治上赋予稷下学者“不治而议论”的权利，允许他们议论国事、参与政事。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齐王不拘一格降人才，即便是身份低微的人，只要有真才实学，都能够受到尊宠和厚待。历史上齐国的名臣如邹忌、孙臧，皆是如此。前者出身布衣，后者更是刑余之人，却都位列朝班，驷马高车。在这样的人才政策下，稷下学宫人才济济。而稷下学宫的发展繁荣，则源源不断地为齐国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保障，最终使得齐国强于他国。

民风淳厚 善良好客

民间传说，商朝时期齐国国君晋阳在出行途中受到夏家庄庄主的热情招待。晋阳深受感动，认为热情好客、大方爽朗才是真正的待客之道，于是在回到齐国后大力弘扬这种美德。热情好客的传统遂在淄博这片土地上慢慢扎根。“战国四公子”之一的孟尝君便是一位典型的热情好客的淄博人。孟尝君名文，姓田氏，是一位齐国贵族。《史记》记载他好客喜士，有门客数千人，每个人都各自认为孟尝君最亲近自己。对待宾客，孟尝君不吝财物，“舍业厚遇之”；他体贴备至，就连宾客的亲戚也主动馈赠；他尊重客人，无论对方是贵是贱，“皆善遇之”。因此宾客盈门，天下贤士无不倾心向往。

大家爱国守法，积极发展生产，支援国家建设。1950年，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在胡厥文的支持下，次子胡世华第一批申请入伍，踏上了朝鲜战场。1952年，胡厥文担任赴朝鲜慰问团副团长，到战火纷飞的前线看望人民子弟兵。在战场上的所见所闻，使他深受震动。胡厥文倾其所有带头捐款购买战斗机，把在国外教书的女儿寄回的外汇全部捐献出来，支援抗美援朝。他深感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就不可能摆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获得真正的独立自主。

新中国成立初期，胡厥文无私奉献，带头认购公债，服务社会主义建设，率先在自己的企业实行公私合营，带动工商界同仁积极配合国家的社会主义改造，他把两层住房连同工厂一起捐给国家，全家人租房住，从有产者自觉变为无产者，在工商界中起到了示范和推动作用。在胡厥文等人的大力推动下，上海只用了6天时间，数百个行业全部实现了公私合营。

胡厥文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积极为国家建设出谋划策。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他提出有关工业标准化的提案，受到中央重视。他提出机器制造工业是国民经济技术改造的主导力量，机器尺寸必须准确，材料必须优良，名称必须统一。设立标准量具检验所，以校准精密尺寸，建立特种钢材钢厂，并对各种机器、机件定出全国统一名称。他先后就统一战线问题、振兴中药事业、加强设备管理、重视职业教育等向中央提出建议，受到高度重视和采纳。

胡厥文先后当选政协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席，上海市副市长，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五、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在长期的交往中，胡厥文曾写过不少歌颂毛泽东的诗篇。毛泽东逝世时，胡厥文曾赋诗悼念，决心“悲痛化为力无穷，革命到底务贯彻”“庸才自愧一无能，誓跟党走心如铁”。纵观胡厥文的一生，他将毕生精力致力于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经济振兴、社会进步事业，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